

王夫之

史学思想研究



汤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王夫之

史学思想研究

汤城 著

本书系中国矿业大学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项目编号：04212）阶段性成果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夫之史学思想研究 / 汤城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210-08796-0

I. ①王… II. ①汤… III. ①王夫之(1619-1692)
—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8173号

王夫之史学思想研究

Wang Fuzhi Shixue Sixiang Yanjiu

汤城 著

责任编辑: 李月华

书籍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版式设计: 章 雷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143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邮 编: 330006

网 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16, 720 × 1000mm 印张: 15 字数: 215千字

ISBN 978-7-210-08796-0

定 价: 36.00元

承 印 厂: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赣版权登字—01—2016—68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二、学术史梳理	4
第一章 思想背景	15
第一节 政治危机	15
第二节 学风转变	20
第三节 思想基础	24
第二章 史学经世思想	32
第一节 学术经世	33
第二节 以史为鉴	47
第三节 解决实务	57
第三章 史家修养思想	65
第一节 史家心术	66
第二节 史家叙事	73
第三节 史家通识	82

第四章 历史编纂思想	91
第一节 编纂要求	91
第二节 体裁体例	102
第三节 史料剪裁	107
第五章 经史关系思想	115
第一节 尊经重史	116
第二节 《春秋》学与史学	123
第三节 易学与史学	149
第六章 史论原则和方法	178
第一节 权衡方法	178
第二节 知人论世	190
第三节 揆厥所由	199
参考文献	208
附录《读通鉴论》与清代社会	220
后 记	233

绪论

一、选题缘起

明末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发展走向衰老的一个大转折阶段，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总结和嬗变时期。白寿彝先生指出：“明清时期，是中国史学史的第五个时期。它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这时，生产力在继续发展，而生产关系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新生产力的发展不够强大，还不能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这是社会进程的一段微妙时刻，很容易迷惑人，使人给它作偏高或偏低的估计。我们说它衰老，不说它是解体，就是说它已经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但生命力还是有的，甚至还相当顽强。这种特点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是因循保守气息的充斥，另一方面，是反映时代抗议精神的优秀作品在不断问世。”^①这里明确指出了明清时期社会发展的特点及其在史学上的反映。瞿林东先生则进一步指出：“清代前期（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的史学，是古老而辉煌的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明后期腐败的政治,尤其是明王朝的灭亡,以及清前期统治者一度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都深深地影响着这个时期史学的面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史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思想和文献的积累,丰富而厚重;在历史进程中,它们不仅为人们所传承和弘扬,也不断为人们所审视和估量。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衰老的景象,新的社会因素开始滋生和微弱地发展,从而使这种审视和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新的趋向。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清前期的史学发展,具有总结与嬗变的特点。总结,既反映在历史思想和史学理论方面,也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嬗变,主要反映在历史思想领域。”^①这里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清代前期史学所具有的总结和嬗变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也呈现新的特点和面貌。侯外庐先生说:“中国思想史有一个优良传统,每到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和发展,思潮也就有了转向和进步,这个阶段的中国哲人便做出他们自己时代所能做出的总结。”又说:“中国思想史上的每一次的总结,不但批判了过去的传统思想,而且发扬着另一时代的新的端绪。”^②这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总结明末清初启蒙思想的特点。吴怀祺先生则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认为:“明清之际的史学思想带上自己的特点。历史的批判却又带着复古的色彩;变革现实的要求仍然在旧学中寻求答案;哲理的思辨达到古代的高峰,但却是没有实验科学的基础,这就不能不限制它的成就。”^③这些认识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揭示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具有批判、总结与创新的特点。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上名家辈出的时代。在众多思想家、史学家中,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著述宏富,思想博

①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0页。

② 侯外庐:《侯外庐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265页。

③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

洽，著述囊括经、史、子、集；他们大多成为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的集大成者或开拓者，开清学之风气。虽然在治学宗旨、学术追求上有共同的取向，但由于社会遭遇各异，学术造诣各有专长，他们治学方向和学术风格明显不同。正是由于这种差异，三者清代前期学术命运迥异。黄宗羲被尊为清代浙东史学的开山；顾炎武被奉为乾嘉考证学的鼻祖，名盛于时；而王夫之凄苦隐没，学术湮没不彰。直到近代，随着社会剧变、学术思潮的演进，王夫之的学术逐步被发现，其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逐渐得到重视和提高。时至今日，国内外学界对王夫之学术研究的热情方兴未艾，学术成果不断涌现。这种现象引起后世史学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同时也给后人提出了深刻的思考和启示：史学与时代、社会三者之间密切关联。

就王夫之学术研究的整体而言，学界对王夫之哲学、文学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对其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明显薄弱。这一境况主要由两方面引起：一方面，王夫之哲学、文学的巨大成就掩盖了他的史学成就；另一方面，王夫之对史学的认识鲜有专篇论述。这两点因素都是显而易见的，而第二点尤需补充说明。除《读通鉴论》《宋论》两部史论著述外，王夫之的经、子、集方面著述及传志、碑铭等文献，也从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史学见解。萧蓬父先生曾说：“王夫之……早年写的书虽名为说经，实际大都是论史之作，是他的系统史论的古代史论部分；晚年写的两部巨著，对秦以后漫长的中古史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评论，是他的史论的代表作。这些书都采用观点和史料相结合的形式。并且在这些书中，王夫之都有意识地把评史和论政两者统一起来，借评论史事，来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他也借对历史现象的分析，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①台湾学者许冠三先生则认为：“船山之论史也，非止借评史以论政，而更重要的是，他一方面假历史分析以

① 萧蓬父：《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江汉学报》，1962年第11期。

阐发其哲学思想，一面又在其哲学思想引导下解说历史，探究上下古今治乱、离合之原，兴亡、得失之故，并进而褒贬古人谋为之是非、功过。”^① 这些认识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深刻揭示了王夫之史学思想的丰富内容和鲜明特点。

综上所述，王夫之史学思想研究不失为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学术话题。通过系统研究，不仅能够丰富王夫之学术研究的内容，还能够以此为突破点，发掘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演进路径及特点，揭示史学、时代、社会的密切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王夫之史学思想，对进一步丰富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研究，对推动当今史学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二、学术史梳理

王夫之学术由湮没不彰到逐渐复兴，历时近百年，其思想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影响巨大。故王夫之学术逐渐引起后人的重视，至今已成为学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这里仅就与本选题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评论。纵观国内王夫之史学思想研究状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19世纪下半叶，是王夫之史学开始传播的阶段。1840年以前，王夫之著述流传甚少，所见者仅限经学之类，而其史学著述则鲜为人知。直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王夫之著述的广泛出版、传播，他的史学研究开始引起时人的关注和评论。如曾国藩说“船山说经高于论史”^②，“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例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祐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欧阳兆熊认为“船山经学外有《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其中称公、称子、称官、称字者不过十数人，余皆直书其名，如堂

^① 许冠三：《王船山的历史学说》，《活史学丛刊》，1978年第3期。

^② （清）王夫之：《船山全书》（16），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58页。

上人判堂下人曲直，不稍假借。虽曾文正亦疑其诋毁古人，持论过刻。不知先生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亦如《南华》之寓言十九耳。其以申、韩诋诸葛者，见明政之尚刻核也；痛斥许鲁斋，谓国初诸老也……知人论世者，必将当时事迹比而观之，方知其用意之所在”^①；吴廷栋谈到“所谕王船山先生《通鉴论》，某知之既深，命为一文以明之。……盖船山先生直是遁世无闷、独立不惧之学，其独往独来之气，真能推倒一时，开拓万古。追踪横渠，而深契程朱心源，又博及群书，不遗细微，每因一事一言而隐探道要。但震于其议论之奇辟，视同武王非圣人之论，粗矣。即谓其身经国变，借古人以摅忠愤而涉于偏，亦犹浅也。非得程朱之心源，故不能得其立论之根柢；非溯程朱之心源，即不能折衷其用意之离合”^②；郭嵩焘认为“船山王氏《通鉴论》、《宋论》，通古今之变，尽事理之宜，其论事与人，务穷析其精微，而其言不过乎则”^③，“自唐世已多论述古事之文，而未有成书。宋儒著录始繁，然大抵沿《通鉴》立论，或专及一代之事。盖春秋以前，《诗》、《书》所载，圣人有不及详，固非后世所能论定也。国朝王船山先生《通鉴论》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粹然一出于正，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④；王炳燮论道“《思问录》、《俟解》诸编，最纯之作。论史尤多精理名言，可以振聋聩而发人神智，有功世道不小。虽不免时露疵累，其为源泉之水无疑也”^⑤；等等。这些大多以日记、札记、杂谈的形式评论王夫之的史论成就、得失、思想渊源等问题。

其中，赵烈文对王夫之的史学著述评论较为广泛。如对《读通鉴论》的

①（清）王夫之：《船山全书》（16），第577—578页。

②（清）王夫之：《船山全书》（16），第580页。

③（清）王夫之：《船山全书》（16），第583页。

④（清）王夫之：《船山全书》（16），第583—584页。

⑤（清）王夫之：《船山全书》（16），第621页。

评论，“沉雄博大，识超千古”“《读通鉴论》言向极谏封事，不当言接近宗室，类自为谋，授人以隙。窃以向目睹王氏之强，私树宗室，以为援系，惴惴至诚，为社稷计厉害，何暇避嫌，此论褊矣”“广简易不用部曲，盖以军行绝漠，士卒劳苦，可以休息，使士气常逸；此亦兵家常有，然所以能如此者，以斥候远、耳目明耳。程不识所行，自是将军常法。此各有所见，所谓运用之妙，存于一心，难以优劣论之。明人王而农以为李攻兵而程守兵，甚非”；对于《宋论》的评论，“不能不重为先生惜也”“此言信为允当”；对于《噩梦》的评论，“论时事利弊，以己意变通之，俨然一王之制。其精当者固不少，而武断孟浪处亦多”；对于《黄书》的评论，“黄者中也。其言尊中国、攘夷狄，盖亡国之痛，激于中而然。首篇《原极》，言自古中国必先自卫其同类。次篇《古仪》，言夷狄之祸始于嬴秦之罢封建，而成于赵宋之释兵权，语多过当。三篇《宰制》，分天下为十一使，又边境为七使，各设帅臣共”；等等。^①赵氏虽然没有深入探讨王夫之的史学，但其讨论的范围明显更广泛。

值得一提的是，俞樾认为“王船山先生长于史学，于山川形势、古今成败，能历历言之，其议论亦反复详尽，极文章之雄。至于说经，则有未尽精密者。所注诸经《稗疏》，《四库全书》皆著录，然读注而不屑读疏，执一经而不旁求之他经；其诗《稗疏》，喜攻朱传而自蹈于踳驳者，往往有之。读其书而为辨证其误，固后学者之事也”^②。他明确提出并肯定王夫之在史学上的突出成就，涉及历史地理、成败兴衰、历史考证诸方面。

这一阶段随着王夫之著述的公开出版，王夫之史学开始传播，其传播主体以湖南士大夫阶层为主，传播途径以书信、日记、札记等为主；主要内容多从读书、治学等层面，评论王夫之史论的得失。显然这时期对王夫之史学的认识，还比较肤浅、零散。

①（清）王夫之：《船山全书》（16），第613页。

②（清）王夫之：《船山全书》（16），第627页。

(二)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王夫之史学研究的兴起阶段。其一,维新派揭起变法改良的大旗,对王夫之史学思想广泛阐说。如康有为认为“王君作《通鉴论》,尚发出春秋不如后世之说”^①,宣扬历史进化及变法改制思想;谭嗣同对王夫之的学说加以发挥,包括变法兴实学、重人材、历史进化观、治乱之故、吏治之方、宣扬气节等方面^②;梁启超认为“《读通鉴论》、《宋论》两编,史识卓绝千古,其价值至今日乃大显,无俟重赞。亦《黄书》亦《明夷待访》之亚也,其主张国民平等之势力,以裁抑专制,三致意焉”^③;等等。其二,革命派为宣扬政治革命,对王夫之学说的发挥不遗余力。如章太炎批判君主专制,倡导种族革命,认为“王而农著书,一意以攘胡为本”^④;章士钊高度赞扬王船山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称“船山之史说宏论精义,可以振起吾国之国魂者极多。故发愿申说以告世之不善读船山之书,深辜船山之意者”^⑤“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而清室以亡。……船山志在鼓励本族,从事光复”^⑥;等等。

这一阶段研究的显著特点是:王夫之的进化史观、民主思想、民族思想等得到大力发掘和广泛传播;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试图把王夫之的史学思想与时代任务结合在一起,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依据。这些研究被深深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三)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是王夫之的史学研究的探索阶段。1927年,郑鹤声发表了《读王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宋论》^⑦,把王夫之

① (清)王夫之:《船山全书》(16),第710页。

② (清)王夫之:《船山全书》(16),第711—726页。

③ (清)王夫之:《船山全书》(16),第729页。

④ (清)王夫之:《船山全书》(16),第795页。

⑤ 章士钊:《王船山史说申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31页。

⑥ 章士钊:《疏黄帝魂》,参见《船山全书》(16),第830页。

⑦ 郑鹤声:《读王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宋论》,《史地学报》,1925年6月,第3期第7卷。

的史评分为对史迹之批评、对史书之批评两类，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于史著撰述的宗旨，即崇实、尚公、斥夸、去妄、师古、资治；一是对史著评读的态度，即怀疑、揆实、准是、养志、绝呶、褒贬。这是一篇较早从史学批评视角探讨王夫之史学思想的文章，非常有见识和价值。1937年，张西堂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明王船山先生夫之年表》^①，该书分为传纂、学术、著述考、师友记四个部分，其中以学术为主体，从思想渊源、时代背景、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学、史学、文学七个方面，阐述船山之学。这是一部较早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船山学术的专著，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史学理论研究，也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1936年出版的嵇文甫《船山哲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王夫之历史哲学的著作。他指出“历史哲学乃是对于历史事象的一种哲学的探讨，简单的说，也是一种史观”^②，把王夫之的历史哲学归为“古今因革论”“朝代兴亡论”和“华夷文野论”三大论，并将王夫之的“天理”与黑格尔的“宇宙精神”相比较。1944年侯外庐发表的《船山学案》^③，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王夫之学术的专著。在该书第八节详细阐述了王夫之的人类社会史论，他认为王夫之的自然进化史观便是他的人类社会历史观的理论基础。侯外庐以唯物史观的方式重塑了王夫之的历史理论，突出了王夫之史论的唯物因素。他从王夫之的历史叙述中分析出船山治史已具有类似近代科学研究的实证精神、较科学的文明观和明显的阶级意识等。侯外庐的观点、研究方法对后来大陆学者的王夫之学术思想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946年贺麟的《王船山的历史哲学》^④一文，将历史哲学界定为“在历史中求‘通鉴’，求有普遍性的教训、鉴戒或原

① 张西堂：《明王船山先生夫之年表》，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② 嵇文甫：《船山哲学》，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58页。

③ 侯外庐：《船山学案》，岳麓书社1982年版。案：此书最早在1944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

④ 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58—273页。

则”，认为王夫之历史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对于天道的矛盾进展或辩证法观点，默契于黑格尔理性的机巧的历史观”，并对其方法论进行了总结。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王夫之史学研究蒸蒸日上阶段。这一时期，王夫之史学研究成果丰硕，成就突出，主要体现在：

1. 关于历史观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关于王夫之历史观的讨论，以姚薇元、萧萐父、嵇文甫、吴泽等为代表，他们的研究成果收录在《王船山学术讨论集》^①中。姚薇元主要从建立“治统”“道统”新史论、“理势合一”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研究的方法、史学理论进步性及其局限性等方面，比较系统地探讨了王夫之历史理论成就；萧萐父《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也是一篇比较有分量的文章，该文第一部分概述了船山系统史论与其历史哲学的关系，初步揭示了船山史论的新贡献与局限，从古今殊异、今胜于古的历史发展观，“理势合一”“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验天于人”“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说三个方面予以详细论述；嵇文甫《关于王船山的历史观问题》指出了王夫之历史观的局限性和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指出“船山只是把他的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直接应用的历史领域，并没有更进一步真正达到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对于船山不应该有过分的要求。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把他过于现代化，而必须从理论上划出一定的界限”；吴泽《王船山历史观略论》认为“他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而且尚包藏着某些唯心主义的杂质。虽然如此，就其时代来说，王船山确是明末清初一位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在历史上，基本上是唯心主义者；可是确也孕育着某些光辉的唯物的因素和论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王夫之历史观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1985年出版的《王船山学术讨论集》，代表性的成果有黄明同《王船山

^①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王船山学术讨论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

历史哲学的逻辑路径初探》、范阳《论王船山历史观的脉络及其新因素》、冯天瑜《王船山理性主义历史观探微》、李锦全《论王船山历史观的内在矛盾》、徐泰来《船山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还有张岱年《王船山的理势论》(《船山学报》, 1985.1)、余明光《略谈王船山的历史观》(《船山学报》, 1985.2)、曹旭华《略论王夫之朴素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及其局限》(《船山学报》, 1986.1)等, 也不乏新见。值得一提的是, 蔡尚思针对王夫之研究热, 而提出不同的观点, 认为王船山“有时承认历史进化论, 但主要是宣扬历史退化论和历史循环论”, 主张“英雄史观”“地理决定论”, “实在比不上主张先王后王并重的荀况等, 更比不上商鞅、韩非的进化史观”, 并明确指出研究者“要忠于历史, 遵照马列经典作家的教导, 全面掌握有关王船山的事迹及其思想的材料”, 抓住“真正信而有证的王船山本人的论著”, 而“不要入而不出, 过于偏爱”。^①1986年, 黄明同、吕锡琛所著《王船山历史观与史论研究》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王夫之在历史观和史论方面的贡献。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 对王夫之历史观的探讨更加深入、细致。徐泰来《论船山史观的唯物主义体系——纪念王船山逝世300周年》[《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4], 对王夫之历史观的性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论证, 通过王夫之关于人的起源、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发展动力、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农民起义、史学方法等诸多历史问题的分析, 论证船山史观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性质。胡发贵《王夫之历史观的理性精神》(《船山学刊》, 2006.3)认为王夫之具有明确的历史意识, 即理性精神, 表现在对传统史学荒谬观点的批判、对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许苏民《论王夫之的历史进化论思想》(《江苏社会科学》, 2007.2), 指出王夫之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具有系统理论的历史进化论者, 从文明的多源发生

^① 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51—160页。

及其兴盛与衰落，文明与野蛮的相互转化、进化与兴亡治乱，以及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道器关系问题，提出并阐发了“时异而道不同”“道因时而万殊”等一系列深刻命题。汪学群《王夫之的理势观》（《中国哲学史》，1996.4），把王夫之的理势观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理势观的内涵作比较，认为王夫之理势观的独特之处，不仅反映在理论上的创建，也表现在实际运用上，把理势理论的研究与对历史史实的分析结合起来，同时也体现经史合一的特点。

2. 史学成就和特点的研究。其一，宏观研究方面。白寿彝从历史观、史学的经世致用、文字的表述等方面总结了王夫之的史学思想成就和特点。^①瞿林东从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精于辨析的兴亡论、史学经世致用等方面总结了王夫之史论的历史价值。^②吴怀祺总结了王夫之的历史盛衰思想，认为“到了明末清初王夫之的通变和历史兴亡论，中国论历史兴衰的史学思想也发展到了自己的高峰”^③。朱仲玉认为“《读通鉴论》作为一部著名的史评书，在史学本身有许多可取的见解”^④，主要从王夫之的历史发展观、历史盛衰论、进步的史学观三个方面阐述。还有一些文章总结了王夫之的史学思想，也颇有见地，如余明光《王船山的史学思想》（《船山学报》，1987.1）一文认为王夫之史学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现实性、实用性、哲理性、人民性。李季平《王夫之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4.1）一文总结了王夫之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贯穿于著述之中，以是否有利于民族利益为臧否人物和评论朝政得失的重要衡量尺度，提出了“理势合一”“趋时更新”的史学理论，认为历史是发展、进化的，主张从事著史、论史必须有自己的宗旨和原则，并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最后指出其思想的局限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82—83页。

②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第691页。

③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275—276页。

④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299页。

性。叶建华《王夫之的史学本体理论》(《浙江社会科学》,1992.6)一文,主要从史学目的论、史书编纂论、史学评价论、史观论,总结王夫之的史学理论。肖平汉《王夫之的史论体系》^①,把王夫之的史论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这个体系由历史理论、史论编纂原则与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构成。王培华《王夫之史论的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1990.1),从史学史的角度,揭示了王夫之史论的史学价值,即王夫之史论在历史认识上的价值、王夫之史论的史学价值。其二,个案研究方面。从史学比较角度揭示王夫之史学价值和特点,如施丁《王夫之对司马光史论的批评》(《史学史研究》,1987.2),把王夫之与司马光的史论作比较,揭示他们不同的史论特点;严衡山《王夫之与司马光史学思想比较》(《史学月刊》,1991.1)则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了二者的史学思想之同异,并分析其原因。从史学功用角度探讨王夫之史学思想和价值,如萧薰父《王船山人格美浅绎》认为“船山之学,以史为归。‘史’在船山,非记诵之学,而是可资能动取鉴的镜子。‘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通过‘史’,发现自我的历史存在,感受民族文化慧命的绵延。‘鉴之也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可以唤起和培育巨大的历史感”^②;王立新《从胡宏到船山看湘学经世特点的形成与转型》(《船山学刊》,1997.2),从宋代到清代湘学经世致用特点的由来及其转型揭示王夫之经世致用思想的特点;胡发贵《经世致用——王夫之与清初学风》(《船山学刊》,1998.1),则从学术转变的内在理路探讨清初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充分肯定了王夫之所作的重大贡献;汪学群《王夫之易学中的实有思想与清初务实学风》(《周易研究》,2000.3)一文,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王夫之的实有思想,以及与清初务实学风的关系,对深入探讨王夫之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于经史关系的探讨,如吴怀祺《王夫之的易学与史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2008年湖南省船山学研讨会船山研究论文集,转引自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② 罗小凡、王兴国主编:《船山学论》,船山学刊社1993年版,第6—7页。